

# 冯友兰与西南联大

田文军

(武汉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冯友兰以哲学家、哲学史家名世,但冯友兰也是一位教育家。作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坚持民主办学的理念,以丰硕的学术成果,教书育人,培植西南联大的人文精神,服务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为西南联大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冯氏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冯学研究课题。

**关键词:**冯友兰;西南联大;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6)01-0001-04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西南联合大学曾经创造自己独特的历史。这段历史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只存在9年。在9年的办学实践中,联大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事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英雄儿女,而且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正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并为后来新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1999年,国家表彰23位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其中就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与办学精神受到全世界的推崇与景仰。当年西南联大的创建者中,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也不乏德高望重的师长,冯友兰属于后者。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拓展了自己的学术事业,也为西南联大的建设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回顾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及其对创办西南联大的贡献,考察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同样会带给人们启示与教益。

## 一、参与联大管理 实践民主办学理念

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南迁湖南创办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基础上组建的。“七七”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北方高校南迁,并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组建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开办不久,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战火漫及长沙。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继续办学。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历经艰辛,于1938年初陆续抵达昆明,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早在1938年2月,冯友兰即由学校安排,计划乘

汽车前往广西桂林,经越南河内转赴昆明,但途经广西凭祥时,不慎手臂骨折,后滞留河内疗伤,直到1938年4月上旬才抵达昆明。其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与法学院暂在云南蒙自办学。蒙自是一座美丽的边陲小城,蒙自人民像昆明人民一样把联大学生看做国家富强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希望,满怀热情地欢迎联大师生。冯友兰抵达蒙自时,文、法两院师生已经正式开课。

当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以常委会的形式组成全校领导机构,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主持校务,并组织多种专门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胡适受聘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选为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教授会主席,并被聘为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设计委员会主任,课程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沿袭长沙临时大学的管理体制。西南联大成立以后,胡适因参与国民政府的外事活动,无法履行其文学院院长职责,西南联大遂于1938年4月举行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决定在胡适归国之前,由冯友兰代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职务。冯友兰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所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教授委员会主席之职,则由北京大学汤用彤教授接任。冯友兰是在西南联大常委会决定其代理文学院院长职务以后才抵达蒙自的,因此,他抵达蒙自不久即开始参与联大的管理工作。1938年9月,胡适正式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直到抗战结束,胡适始终未能回联大履行其教职。因此,直到西南联大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冯友兰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职务,并兼任西南联大建设设计委员会委员、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

收稿日期:2005-10-12

作者简介:田文军(1948—),男,湖北鹤峰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联大校务会议司选委员会会议召集人等职务。可以说冯友兰对于西南联大的行政管理耗费了不少心力。因为,他身兼多职,实际上全面地参与了西南联大的管理工作。

冯友兰曾留学美国,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同时,他熟谙中国教育的传统与现状。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思考“怎样办中国的大学”,并有志于自己管理一所大学。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他曾认为,中国要输入新学术,清理旧传统,求取学术上的独立,必须发展高等教育,并把本科教育、研究机构、出版机构视为现代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经过后来在大学中的教学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实践,冯友兰又逐步从实践中体验到在大学教育中坚持学术至上、推行教授治校对于大学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西南联大,冯友兰主持文学院工作,除了贯彻自己关于“怎样办中国的大学”的一些思考之外,所着力推行的主要是民主办学的精神。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冯友兰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有深入的了解。在联大期间冯友兰曾经说过:“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在他看来,保障民众的民主自由乃“社会进步之常理,经世建国之要道”<sup>①</sup>。应该说西南联大期间,冯友兰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是全面实践了自己的民主办学理念的。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曾认为“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才得以“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种观念不仅是对联大工作的一种评断,实际上也可以看做冯友兰个人工作的总结与体验。因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的中文系、外国语文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一批著名学者。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吴宓、钱钟书、朱光潜、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等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知名人物,当时都是文学院教师队伍中的成员。作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要带领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建设西南联大文学院,除了以自己的才能、学识争取教授们的信任与合作外,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们,团结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这些教授在西南联大文学院的作用,才有可能在战争年代培养大批国家民族需要的人才。

当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常委梅贻琦,也十分强调学校行政人员的服务意识,注意发挥教授在学校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冯友兰与梅贻琦在清华就

已共事多年,其办学理念是相通的。实践证明,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工作也体现了一种服务意识。他十分注意发挥教授会的作用,尊重各位教授的工作。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朱自清休假时,由闻一多代理主任之职。闻一多代理主任职务后,制定了中国文学系的发展计划。朱自清回到联大以后,十分欣赏这些发展计划,并坚持由闻一多继续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作为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尊重朱自清的意见。闻一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但自知其政治活动会为联大的工作带来困难,曾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及学术研究计划都告诉冯友兰,并坚辞自己担任的中国文学系领导职务。冯友兰尊重闻一多的意见,又耐心地做朱自清的工作,让朱自清重新主持中国文学系的工作。冯友兰尊重教授的意见,坚持民主办学理念,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在培养学生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原因。

同时,冯友兰也注意关心教授们的生活。闻一多先生遇难时,冯友兰已离开昆明,但他仍与梅贻琦联系,争取学校对闻先生家属的帮助。联大解体后,清华北返,冯友兰对闻一多的家人的生活仍然给予帮助,直到闻一多先生的家人离开北京,投奔解放区。

因此,今天我们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应当肯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云南昆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经和且平”<sup>②</sup>，“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得“民主堡垒”之称号，一则是因为三校师生顺应全民族同仇敌忾、抵御日寇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可以说得益于冯友兰这一辈西南联大的管理者们实践其民主办学的理念，在对西南联大的管理与领导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建构哲学体系 培植联大人文传统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以后,即十分注意吸纳新的学术方法,不拘泥于“信古”或“疑古”,将“释古”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力求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陈旧形态,创造具有清华特色的人文社会学科,并已取得巨大成就。他进入清华以后最终完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最早具备现代学术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西南联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参与联大管理以后,冯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这种学术理念,并身体力行,苦心培植西南联大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传统。

一个民族追求自身文化的革新,需要借鉴和吸纳异民族的学术文化成果;当一个民族面临外族的

①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4卷151页。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4卷153页。

入侵,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时候,在思想观念上,则需要继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抗战年代,只有民族的文化精神,才会唤醒人们去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才会激发人们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冯友兰熟谙这种道理。1939年6月,冯友兰在《历史与传统》一文中认为,民国初年,人们以历史上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为依据,否定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元,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历史与传统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我们说中国的民族多元,是依照历史说;说中国是一元的,则主要是依据传统说。一个民族,有自己在物质方面的连续,也有精神方面的连续。继承民族的文化传统,服务于伟大抗战事业,这种理念构成了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工作的巨大动力。

在冯友兰的人生中,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环境最为艰苦、生活最不安定的一段,他曾将这段生活称之为“南渡”。但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南渡”反倒成了他一生中学术思想最为活跃、学术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除了写下大量学术论文之外,差不多一年出版一部学术专著。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大体上都成书于他的“南渡”生活期间。“贞元六书”的问世,标志着冯友兰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这一思想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也使冯友兰成为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最为活跃,影响最为广远的学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问世之后,曾经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学术一等奖。与冯友兰一同获奖的还有西南联大的华罗庚(其《堆垒素数论》获一等奖)、金岳霖(其《论道》获二等奖)、许宝騄(其数理统计论文获二等奖)。冯友兰的《新理学》之所以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并在当时获得学术奖励,除了其利用现代西方的学术文化观念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在理论上具备其特有的价值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是冯友兰在《新理学》中,以哲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责任,表达了自己以学术服务于民族抗战的信念与追求。这种信念与追求,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增强了人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滋润和培植了西南联大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传统。

西南联大作为一所文理兼备的大学,在这段非常的历史时期,为国家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

些民族的优秀青年之所以能够在西南联大迅速成才,与西南联大文理兼重,注重人文精神与传统的培植是分不开的。西南联大成立不久,即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冯友兰即是成员之一。创作校歌、校训,目的也在于激励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后来由冯友兰写成的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对于西南联大学生的成长发挥过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有在理工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的世界级科学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不乏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在这些学者中,不仅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受到过冯友兰工作的影响,不少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也高度评价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先生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回忆自己的老师吴大猷时,即忆起西南联大的校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也曾专门论及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校歌。2000年11月底,杨振宁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捐资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设立的华英基金会上作过一次演讲,题目即是《中兴业、需人杰》。他讲到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时说:

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做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阙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岳飞的《满江红》的第二阙开头四句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冯先生把它改为:“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幸而言中,联大前后培养了三千多名学生,为中国建设、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五十多年以后,中华民族的地位有了巨变。今天如果再讨论此四句,似应改为:“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需人杰。”从“终当雪”到“既已雪”,这是多么痛苦,多么困难的经历;这是二十世纪几代中国人的浴火重生的血泪史<sup>①</sup>。

杨振宁先生晚年仍清晰地记得冯友兰所作的西南联大校歌在三四十年代给予自己的深刻影响。他晚年的回忆告诉人们:一个能够在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常常成长在有深厚人文精神底蕴的

<sup>①</sup>《光明日报》2001年1月11日。

名校之中。西南联大的历史即是最有力的证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一所大学而言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今天,当人们回顾西南联大的历史,在怀念叶企荪、吴大猷等理科师长的同时,也愈来愈敬佩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他们在联大的杰出工作与卓越的学术成就,同样为西南联大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样应当载入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册。因为,西南联大在战争年代培养的学生,既具备现代的科学精神,也有着高远的人生抱负与理想,具备优良的人文素质。而在对联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植中,冯友兰等文科教授是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的。

### 三、坚持教书育人 服务抗战伟业

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之中,教书育人,服务于民族的抗战伟业,是西南联大办学的重要目标。而对于民族文化强烈的责任意识,也是冯友兰与西南联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之中传承民族文化慧命,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的力量源泉。冯友兰企盼伟大的抗日战争能够使自己的民族走向文化复兴之路。他在写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之后,曾在《新世训·自序》中说:“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社会文化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门。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与?是所望也。”为民族的复兴大业增砖添瓦,当是冯友兰抗战期间学术活动的内在追求。这种追求促使冯友兰忠实地贯彻联大的办学宗旨,力图通过自己的具体工作,对民族的抗战事业尽一份责任。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成教学内容,以《新世训》、《新原人》等书作为教材,为西南联大学生开设伦理学课程,以大课堂的形式授课,听课学生有时达数百人之多。他主张人们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提倡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伦尽职,从现实中去理解人生的意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求取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观念曾经在西南联大学生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清华大学原1939级外文系研究生李赋宁,20世纪90年代写成的《怀念冯芝生先生》一文中曾谈及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对西南联大学生吴讷孙的影响:“吴讷孙(笔名鹿樵,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

学生生活)曾对我说他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先生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他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由此可见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对青年人所起的巨大感化和教育作用。”<sup>①</sup>李赋宁先生的文章,表达了人们对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学活动的正面评价。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所讲的伦理学,内容是他理解的人生哲学;冯友兰的人生理论,在内容方面虽兼容各家之学,主体仍是对儒家伦理的诠释与拓展,体现的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实价值。

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实践,增加了冯友兰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方式服务于抗战的信心。因此,在西南联大期间,他除了为学生们讲授自己的人生哲学之外,还走向社会,去重庆宣讲《中国固有的道德》、《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以及《人生的四种境界》。他也曾经用休假时间去成都华西大学等地演讲,演讲的内容,也主要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诠释。冯友兰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讲学,目的都是要以自己的学术活动服务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也极力支持青年学生奔赴抗战的前线。1944年11月17日,冯友兰在出席西南联大教授会时,曾支持征调西南联大四年级男生作译员的议案;在同月29日的西南联大知识青年从军演讲会上,曾呼吁青年学生走上抗日的战场,肩负起自己对民族的责任。在这次演讲会上,表示支持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教授,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以及朱自清、闻一多等。冯友兰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即不应当推卸自己对民族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冯友兰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还把自己的长子冯钟辽送上了抗日战场。冯钟辽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后来参军。1944年11月,冯友兰呼吁西南联大学生参军的时候,冯钟辽已经走上了抗日战场。冯友兰在其《祭母文》中曾特意提及冯钟辽从军:“应盟军之东至,辽从军而远征,渡怒江而西进,旋奏绩于龙陵,继歼敌于遮放,今次师于畹町。斯吾母之遗体,为国家之干城,虽名位之微卑,亦告慰于尊灵。”冯友兰以冯钟辽从军抗日告慰自己的母亲,表明了他忠于国家、民族的意愿与心迹,也表明他作为西南联大教员,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贯彻联大的办学宗旨,服务于民族的抗战伟业。

①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26—327页。

国哲学的逻辑理性化重建,它不仅赋予中国哲学以逻辑的形式,而且在哲学方法上发展了中国哲学,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李翔海(南开大学)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指出,由于冯友兰对理性的多元性缺乏足够自觉,有把西方逻辑理性看做是理性之惟一形式的倾向,没有深入挖掘与中国哲学特定形态相应的不尽同于西方的理性形式,因而难免使得本来具有丰富内涵的“理”、“气”、“大全”、“道体”等中国哲学范畴成为空洞的形式符号。欧崇敬(南华大学)提出,与熊十力没有真正提出一套独创的方法论不同,冯友兰则有着自觉的方法意识。除了逻辑分析外,新理学的某些方法还得益于冯氏自己最称道的中国哲学家及流派,如公孙龙、程朱、魏晋新道家(玄学)、禅宗等。冯氏的方法论使用可看做是中国当代哲学走向原创之路的一个实验过程。胡伟希(清华大学)认为,冯友兰用正的方法提出的四个基本观念与相应命题,其实就是本然陈述。如果从金岳霖关于有

本然陈述的观点出发,这些表达形上世界的观念或命题,都是不能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建立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的印象,症结也就在这里。柳仁熙(韩国延世大学)在《冯友兰新理学与亚细亚哲学的发展——反知、致知分类法的意义》中指出,冯友兰吸取西方的理性注意的致知传统建构新理学,改变了亚细亚哲学中的“无知”和“反知”传统,不仅对中国哲学是一种推进和变革,而且对亚洲哲学也是一种推进和变革。

另外,刘鄂培的(清华大学)的《接着芝生师的“旧邦新命”继续讲》、赵复三的《现代中国哲学的难产和哲学的再生》、刘颖《现代境遇下冯友兰对宗教的拒斥与容纳》等都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观点。

大会闭幕式上,著名学者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生作了精彩的总结,他希望大家继承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使命感,为使中国哲学在21世纪大放异彩而努力。

[责任编辑:裴 喆]

(上接第4页)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1946年10月10日,恢复建制以后的清华大学在北平正式开学。随着清华大学恢复建制,冯友兰也结束了自己的“南渡”生活。8年“南渡”,使冯友兰的人生不断接受洗礼,不断经历考验。民族主义的立场与信念,支配冯友兰走过了8年艰苦的“南渡”之路,也使冯友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西南联大的创建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历史会记住西南联大的辉煌,也会记住西南联

大的创造者,记住冯友兰这一辈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为西南联大付出的艰辛,耗费的心血。冯友兰这一辈知识分子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与实践经验,也会给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激励我们在新的世纪,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培养大批“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早日实现我们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文化的宏伟目标。

## Feng Youlan and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TIAN Wen-jun

(Philosophical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Feng Youlan was not only famous for a philosopher and a philosophical historian, but also an educator.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literature college, Feng Youlan insisted his own ideas of running a school. He imparted knowledge and educated people, fostered the humanities spirits of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and served the cause of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his substantially academic fruits. It was he that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Feng Youl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have provided the other important topic of Feng Studies.

**Key words:** Feng Youlan; the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education; practice

[责任编辑:裴 喆]